

些规律性的联系,既可为寻找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依据,也可为一定目标模式下的政策选择提供依据。

比较经济政策是关于经济政策的研究,但它不是研究一切经济政策或经济政策的一切方面;它是比较的研究,但它不是对各国的政策目标、手段、效果的罗列比较。它力图说明的是这些经济政策的工具目标差异背后的差异,决定差异的差异即经济机制的差异。它通过各种模式中政策差异“是什么”的说明,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经济政策应分为三大部分,即体制政策、调节政策和微观基础政策。在这中间,关于调节政策也许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体制政策和微观基础政策。

体制政策是一个首先见诸于德国经济学家德语经济学著作中的词,被定义为确定经济活动中个人与集体相互关系的体系结构的一种调节政策,是经济调节的基础问题,是一个操纵系统。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体制政策。这种体制政策,在德国就是国家制造一个适合于竞争的环境,一种既保证市场机制充分作用,又维护社会安定、社会责任的体制。不论在其他国家采用何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框架,“体制”这一层次、这一要素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正是由于它与调节政策一样,是由国家选择决定的(只是其中的政治历史因素更强),我们可以称其为“政策”。在这个体制政策中,干预是一种政策,不干预也是一种政策;干预不干预是基本政策、大政策。在干预政策中又有通过什么途径进行干预的问题,主要靠计划指令还是靠对市场进行调节,怎样结合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在不干预政策中,又有在基本不干预下有所作为、弥补市场不足的各项具体政策。这些问题,既是一个体制问题,又是第一层次的政策问题。任何一种模式,总是先有这种大政策,然后才有各种具体政策。

把体制问题作为政策比较的一个层次来研究,与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存在着对象上的相似性,即都注重于体制问题。但也存在着差异,即研究角度上的差异。比较经济体制从体制的一切方面进行比较,而体制政策只注重于体制如何被设计为一个国民经济的可控系统,在经济的控制上提供了一个怎样的框架。比较经济体制把差别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体制政策更多地注意的是两种经济中的各种特定模式的差异。

微观基础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体制政策,其原因是,微观基础总是与一定的体制相辅助成的。虽然不能说一一对应,但微观基础总是与一定体制相适应的。只是两者与调节政策在关系上不同,在经济学上即宏观微观之别,才需要加以区分并分别研究。分别研究的另一原因在于,与相对稳定的客观体制模式相比,微观基础是易变的。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来看,是不断调整的领域。

西方就业理论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林珉玳

西方就业理论是为了解释失业问题和就业波动现象而创立的。这些理论与在此理论基础上的制度,对于我国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尖锐,出现就业波动。萨伊认为,市场经济内部不会有生产过剩和失业,“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马歇尔的观点与萨伊相似,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只要劳动力市场没有人为阻力,可以通过工资的自由涨落和劳动力供需之间自发调节,而达到充分就业。

1929年到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就业水平取决于一国对产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水平,资本主义经常出现失业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为此,凯恩斯提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在解决失业的途径上,无论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所持观点都是降低实际工资,但是马歇尔是在不改变价格水平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而凯恩斯认为工资刚性,难以下降,“货币有幻觉”,工人重视货币票面而不太重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他主张通过价格水平的提高来降低实际工资。

本世纪50年代末,菲利普斯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交替的观点,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由此引申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即政府只要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即可。本世纪5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定通货膨胀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它与失业之间不象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有较长期的交替关系。他提出自然失业率问题,论证这种失业率不是扩大总需求所能降低或消除的。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只是短期内特定条件下才存在。

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以农村和城市相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为特征。本世纪60~70年代,西方一批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创立了分层劳动力市场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有三元劳动力市场:即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变阶段的国家来说,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能吸收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技术水平低下的剩余劳动力;其次,通过进入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接受非农业产业就业方式的初步训练,受到城市的文化熏陶;再次,非正规部门就业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为正规部门的现代化企业输送劳动力。

我们可以借鉴的西方就业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我国,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等原因,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客观存在的现象。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可能追求100%的就业率,我国政府尽管积极提供就业服务,千方百计降低失业率,但是自然失业率也是存在的,弗里德曼提出的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方法在我国也适用。第二,我国确实存在刘易斯所论述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特别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问题,研究和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化。第三,近几年,我国各大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越来越多,据统计,上海的流动人口有300万,经上海外来劳动管理部门批准的进入正规国有集体企业的仅有60万,近百万流动人口从事小摊贩、修鞋、饮食店等工作。政府应重视对这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管理。